

中國正統論對於日韓越的影響

朱雲影

中國文化圈之歷史的研究(九)

一

中國正統觀念之形成，實導源于儒家的大一統思想。禮記曾子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公羊傳隱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儒家既以大一統為最高政治理想，所以某一時間僅能承認一人統治，一國統治。書大禹謨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詩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是事實却不盡然，某一時間往往有多頭統治，列國分立，因此就發生了「正」、「不正」的問題。公羊傳隱公三年曰：「故君子大居正。」歐陽修正統論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究竟如何為「正」？如何為「不正」？雖然古來史家聚訟紛紜（註一），但大體可歸納出幾個原則：

1. 割據為不正。司馬光說：「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又說：「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于後，……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皆以列國之制處之。」（註二）可見司馬光的意思，惟以能統一九州為正，割據則為不正。歐陽修也說：「據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僭竊並興，正統無屬，則正統有時而絕。」（註三）也是以割據為不正。

2. 篡奪為不正。劉知幾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註四）朱熹將古來的國家分為八種，僅以周、秦、漢（包蜀）、晉、隋、唐為「正統」，凡篡位干統而不傳世者，如漢之呂后、王莽、唐之武后之類，謂之「篡賊」，乘亂篡位或據土，如三國之魏、吳等，謂之「僭國」，皆認為不正。（註五）

3. 夷狄之國為不正。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註六）唐皇甫湜著東晉元魏正閏論，首以種族區分正閏。宋鄭思肖著心史，更力倡民族主義，主張南史應改稱四朝正史，北史應改稱胡史。明丘濬撰世史正綱，以漢唐為華夏純全之世，三國為華夏割據之世，南北朝及南宋為華夷分裂之世，東晉及五代為華夷混亂之世，胡元為夷狄純全之世，于

(326)

元之混一天下，依綱目南北朝五代例，分書其年號于甲子之下。王洙著宋史質，更進一步，不但將遼金兩代列于外國，甚至將元代年號完全削除，就都是不許夷狄亂統。

割據、篡奪既是不正，不可以爲統，所以要求擁護中央；夷狄之國既是不正，不可以爲統，所以要求抗拒外族；這正是春秋以來的尊王攘夷精神。宋孫復說：

「春秋尊天子，貴中國。貴中國，所以賤夷狄也，尊天子，所以黜諸侯也。」（註七）

由于黜諸侯，賤夷狄，所以重視大義名分，嚴辨華夷內外。從歷史上看，正統論雖不無流弊，却有更多更大的貢獻。

日韓越各國，環繞中國而立國，一切文物制度大抵傳自中國，自然也難免受到中國正統論的影響。茲試根據各國的歷史，分別加以檢討。

二

日本之得以建立並鞏固天皇中心的統一國家，可說完全由于中國正統思想的影響。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前，仍保留部落時代的遺風，一般並不知王室之尊，自然無從建立有權威的中心領導。聖德太子攝政，爲了革新政治，接受中國的尊王思想，大事宣揚。推古十二年（六〇四），制定憲法十七條，其第三條曰：

「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方（万）氣得通。地欲覆天，則致壞耳。是以君言臣行，上行下靡，故承詔必慎，不謹自敗。」（原文）

又第十二條曰：

「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爲主。」（原文）

此種思想啓蒙運動的結果，不到半個世紀便實現了日本史上劃時代的大化革新。原來皇極天皇在位時，蘇我蝦夷與其子入鹿，專擅國政。皇極元年（六四二），蝦夷建祖廟于葛城高宮，舞八佾之舞，又預造兩墓于今來，一曰大陵以爲己墓，一曰小陵以爲入鹿之墓。三年（六四四）十一月，蝦夷入鹿父子雙起邸宅于甘禰岡，蝦夷自稱其宅曰上宮門，入鹿之宅曰谷宮門，家中男女稱曰王子，宅外作城柵，門旁作兵庫，恆使力人，持兵守備，出入則以士兵五十人爲護衛（註八），凡此種種，無不表現目無君上，所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鎌足，發動政變，誅殺了蘇我父子，遂開始了大化革新。事變後，孝德天皇即位，以中大兄爲皇太子，皇太子奏文有曰：

「天無雙日，國無二王，是故兼併天下，可使萬民，唯天皇耳。」（原文）（註九）

這正是基于「周孔之教」（註一〇）的大一統主義。從此日本定于一尊，天皇始形成特殊的存在。大化二年（六四六），頒佈革新

詔書，列舉新政要點有四，其一便是規定畿內京都之制，此種以天皇所居之政治中心爲京師，而以其周圍一定地區劃爲畿內的制度，日本史家也承認是中國帝王政治之土藏思想的影響。（註一）次年，又制定禮法，規定凡有位者，須于寅時維列南門外左右，候日初出，就廷再拜，乃侍于廳，若晚參，不得入侍。可能日本天皇直到此時，才真有漢高祖在叔孫通率羣臣于長樂宮演禮後「而今始知天子之可貴」的感覺。自此大皇的地位越來越突出，終于成爲金字塔的存在。八世紀二十年代訂養老令，關於天皇的稱呼，亦有嚴格的規定。養老令儀制令第一條：

「天子，祭祀所稱；天皇，詔書所稱；皇帝，華夷所稱；陛下，上表所稱；太上天皇，讓位帝所稱；乘輿，服御所稱；車駕，行幸所稱。」（原文）

此條文，一見便知是酌取大唐開元禮卷三序例雜制：「皇帝、天子、夷夏通稱之；陛下，對揚上表通稱；至尊，臣下內外通稱；乘輿，服御所稱；車駕，行幸所稱」而成。由于「天無二日，國無二土」，所以中國歷代國君即位，大抵踰年而後改元，日本亦受此影響，偶有本紀年而改元者，史家輒痛斥其非。九世紀藤原冬嗣等奉勅撰日本後紀卷十四平城天皇大同元年五月辛巳條：

「改元大同，非禮也。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未踰年而改元，分先帝之殘年，成當身之編號，失慎終無改之義，違孝子之心也。稽之舊典，可謂失也。」（原文）

總之，日本自大化革新至奈良平安時代約五百年的土政，實可說是中國正統思想的一翼——尊王思想在日本的第一次開花。中國正統思想的力一翼——辨內外的思想，也自聖德太子以後漸在日本生根。聖德太子由于受此種思想的刺激，開始竭力對隋爭取對等地位。隋書倭國傳云：

「大業三年，其土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其國言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日出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這是日本對隋實行平等外交的開始，以東海中最大小國，居然對大隋帝國目稱天子，真是未免不自量力，無怪煬帝斥爲「無禮」。次年，日本遣小野妹子送隋使回國，日史載其所携國書，又有「東天皇問西皇帝」之語（三註），但不見于隋書倭國傳。瑞溪周鳳撰善鄰國寶記云：

「東天皇問西皇帝之語，由太子傳觀之，實聖德太子所作之書也。然推古紀內不記所撰人，蓋史之常也。然則日出處日沒處之語，亦或爲太子之所作乎？」（原文）

總之，日本自元外採取國家自尊主義，實始於醉心大陸文化的聖德太子，而將神武天皇即位之年，至少拉長六百年，據近代日本史家的考察，也多認爲出自聖德太子的政策，用意無非欲對外國誇示日本開國之悠遠。（註十三）自此日人的國家意識日趨濃厚

，唐貞觀六年（六三二）高表仁使日，結果失敗而歸，便是由于此種障礙。舊唐書日本傳云：

「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宜朝命而還。」

通鑑卷一九三太宗上之中：

「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宜命而還。」

兩書記載略有出入，自以通鑑爲正確，因爲當時正是舒明天皇在位，並無聖德太子攝政一類的事，所以爭禮者應爲王而非王子（註十四），而且決非表仁「無綏遠之才」，實因日本不甘以蕃國之禮相見，故表仁不肯宣示使命而歸。大化革新後，隨着儒學的興隆，日人的國家觀念逐漸加深。奈良初年，舍人親王奉勅撰日本書紀，即隨處流露著濃厚的國家意識，如該書卷十一仁德紀：

「五十八年多十月，吳國高麗國並朝貢。」

同書卷四雄略記：

「吳國遣使貢獻。」

事實上，是仁德（倭王讚）雄略（倭王武）朝貢南朝，宋書夷蠻傳記載甚詳，那有吳國（中國）反而朝貢倭國之理？這都不外爲了提高日本國家自尊心的曲筆。當時日人又嘗自矜爲「中國」，視大和族以外的異族爲「夷」，試舉一例，以見一斑。平安初期藤原多嗣等奉勅撰日本後紀卷二十一嵯峨紀：

「弘仁二年十月甲戌，勅征夷將軍文室綿麻呂處置俘（虜）。「其蝦夷者，依請須移配中國，唯俘囚者，思量便宜，安置當土。」」（原文）

由上所述，可見日本王朝時代對中國辨內外的思想會發生如何強烈的反應。

平安朝末年，武士崛起，平氏首先稱霸，不久源氏取而代之。源賴朝于一一九二年創立幕府，鎌倉，實施武家政治，自此約七百餘年間，稱爲幕府時代。佚名長崎略（註十五）云：

「開國以來，其君王世守虛器……予奪之權，秉於將軍，而其君不與焉，但受供獻奉祀之事而已，眞所謂祭則寡人也。」

明鄭若曾日本圖纂云：

「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欲望彼國之約束東夷，斷斷乎不能也。」

幕府時代，王權不振，天皇徒擁虛位，廢立取決于大將軍，國家實權完全掌握于大將軍之手。自鎌倉幕府創立，經過百餘年

武人的黑暗統治，投與日本一線光明的，便是中國儒家的尊王思想。鎌倉末年，後醍醐天皇召僧玄慧入宮講資治通鑑和通鑑綱目，宣揚大義名分，當時參加聽講的，有日野俊基、北畠親房等，他們大受感化，隨即發動轟轟烈烈的勤王運動，終于推翻了鎌倉幕府。但不久又有足利尊氏崛起，與勤王派爲敵，雙方相持不下，後醍醐天皇據吉野，足利氏據京都，另立光嚴帝，前者傳四帝，號南朝，後者傳五帝，號北朝，互相對立，凡五十年，史稱南北朝時代。南朝名臣北畠親房鑒于勤王事業之未能圓滿成功，實由于尊王思想尙不够普及，所以發奮撰神皇正統記六卷，首先辨明正統與僭偽之別，尊後醍醐天皇的南朝爲正統，以武人操縱的北朝爲僭偽，這是日本思想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件事。神皇正統記開宗明義章曰：

「大日本，神國也。天祖開基，日神垂統，唯我國有之，異朝無比，故曰神國也。」

以日本爲神國，以神皇一脈相傳爲正統，一面強調國家的尊嚴，一面強調天皇地位的不可侵，實開日本尊皇思想之先河，這也是朱子代表的正統思想在日本首次結下的果實。江戶時代詩人小野湖山有詠親房卿詩曰：

「亂賊紛紛得意初，大賢賢慮有誰如？請看一管春秋筆，編出神皇正統書。」

中山久四郎博士認爲這首詩的意思，就是說春秋精神神傳之朱子，朱子傳之親房，而寫成了神皇正統記（註十六）。和親房同時的東福寺僧即鍊，也頗有功于尊王思想的宏揚。原來中國古來常以「神器」象徵帝位之神聖（註十七），並非實有其器，日人初受中國文化的沈禮，食古不化，却實造了三種神器。日本書紀天孫降臨之條，謂天照大神賜瓊瓊杵尊以玉、鏡、劍三種寶物，在崇神天皇以前，代代天皇與此三種寶物同殿，共床奉齋，崇神天皇時，始以鏡、劍、另覓適當奉齋之地，別模造鏡、劍、留置宮中，自此歷代天皇皆以御玉及模造之鏡、劍爲繼承皇位之御璽。即鍊尤強調三神器的神聖性，所撰王臣論後序云：（註十八）云：

「夫物之自然者，天下皆實之。……所謂自然者，三神器也。三器即神鏡、神劍、神璽，此三者，皆出於自然天成也。……

：彼支那，葱嶺之東數十邦皆取其法度，稱爲中國，又號文物之國，然五帝之世，猶無傳國信器，況遠古乎。……彼支那號大邦，雖土地曠遠，而受命之行，皆出人工，非天造也。我國雖小，開基之神，傳器之靈，不可同日而語。……夫有國以來未遭蠻夷攘奪者，未有如吾國純全者也。」（原文）

此後以持有三神器之大皇爲正統，否則不認爲正統之思想，便逐漸得勢了。

南北朝統一後，武人專政如故。室町幕府末年，豐臣秀吉崛起，以反幕府爲號召，統一日本後，曾避免用大將軍名義，而以太政大臣名義執政，以圖收買人心，但統治期間甚短，且其政權本質與幕府並無二致。十七世紀初年，德川家康創幕府于江戶，復開二百餘年武家統治之局。在長期的武家統治下，盼望恢復文治的心理日趨迫切，而給與此種心理以思想武裝的，便是中國的正統論。尤其江戶時代，幕府定朱子學說爲官學，朱子的大義名分論，使日本士大夫起了強烈的反應。他們提出南北朝正閏論，衆口一聲不承認武家操縱的北朝，而以兩朝爲正統，言外之意，不啻針對現實否定幕府統治。其中水戶學派最爲積極

，水戶藩主德川光圀修大日本史，立後醍醐天皇以下南朝四代本紀，於南北合一之年，起後小松天皇本紀，而光嚴帝以下北朝五代事，附載於後小松天皇本紀之首，是明示南朝爲正統。編者舉南朝爲正統之理由如次：

「皇統之判爲南北，猶元魏之分爲東西乎？曰非也。孝武、孝靜皆出於孝文，固無所輕重，惟視名分所在爲正耳。孝武爲高歡所逐，而孝靜爲其所立，則正統之在西，從可知也。皇統之出後嵯峨，亦無所輕重，惟視神器所在爲正耳。光嚴、光明皆爲叛臣所立，非無神器，而所傳非眞，則不得謂之有焉。然神器之輕重，係人心之向背。人心歸則神器重，人心離則神器輕。天人惟一，道器不二，固非閭閻亂賊之所得而覬覦者。則皇統所屬，不待辨而明矣。明德中，帝受神器於後龜山帝，於是乎皇統合而爲一，聖緒傳於悠久。彼文普六茹亦有所謂傳國受命之聖，而異姓吞噬，父子戕賊，豈可與皇統綿邈亘千萬世，不可動搖者同日而語哉。然則神器之爲靈物，自有所歸矣。嗚呼，盛矣哉！」（原文）（註十九）

上文主旨，顯以神器所在爲正統，但觀其謂「人心歸則神器重，人心離則神器輕」，似又不僅以神器爲物質，而視爲神器與義理並重，亦無不可。水戶初期史臣中，傳有兩派主張，一派專以神器之存否，係正統之標準，代表人物爲栗山潛峯，一派則側重義理，代表人物爲三宅觀瀾（註二〇）。觀瀾撰中興鑑言正統條云：

「其器之所臨，實在其統之當續者，而爰及南北混一，器歸統正，萬萬世下，不復容姦臣賊子朵頤其間焉。神之德昭哉，可不畏哉？」（原文）

相傳編修大日本史之初，北朝五帝皆降爲列傳，足利之黨，悉書賊，後因安積澹泊等的建議，指出足利氏卵翼下的北朝，究竟也是皇統一系，爲今天皇之祖宗，纔改附北朝五帝於後小松紀之首（註二一），結果足利之黨亦免書爲賊。水戶學派外，主南朝爲正統者甚多，史家賴山陽亦以神器之所在爲正統。日本政記卷一云：

「祖宗之意，夫人之所嚮，是爲正統。正統之所在，神器歸之。神器之所在，正統歸之。」（原文）

賴氏又著南北朝正閏論，發揮他的主張淋漓盡致，文曰：

「或謂賴襄曰：子之論正統，似也，抑子非亦北朝之臣子乎，何不諱？曰：何居，子所謂北朝者安在？曰：今朝廷是矣。襄曰：於戲！今朝廷者，神武以還大一統之朝廷也，何以曰北？曰北者，延元、元中間，天子南遷，而賊臣私立君，當是時，南則正，北則僞，事兩者榮，事北者辱，故不得不別其稱也。已而天悔其禍，祖宗誘其衷，講和議成，南北混一矣。夫以後龜山之瑣尾流離，其授神器也，不肯從降式，必用父子禮，足利義滿之凶威而不能奪也，於是後小松始傳器受禪，尊後龜山爲太上天皇，事懿禮善，足以盪滌前此分派之陋，上承列世之統，而下顯示後世，蓋天與祖宗實佑之，非足利氏之所能爲也。雖其後內有紛紜，而天命大定，以至至今。賊臣之蟄據輦轡，濁亂朝廷百餘年者，畢伏誅竄，朝廷復其清明，大其一統，如日月再中天，而山河皆明也，而何苦猶汚其口吻，曰北曰北耶！夫曰北，則見其爲足利氏之門生，而以小朝廷自處也，此非臣子之當諱者哉。今夫執童孺問之曰：汝義貞、正成徒也，則欣然喜，曰：汝尊氏屬也，則慨然怒，今

自稱北朝，則勢必以足利爲定策國老，而以新田、楠爲賊，甘背天下人心，萃萬衆唾罵，何哉！夫天與祖宗既已授之升於天矣，而不欲就，以冢中枯骨介意，而猶陷廂廩蕞穢之中，終古不肯洗滌，是所謂自賊其居者也。余則不取，故余修史，專用南朝年號，今作政記，於延元元中間，不得已分注某年，至後小松以後，大書直接列聖之後，以明大一統，如曰祖宗之統也，非足利氏所得立也。敬君乃臣子之心已，此義不明，則萬世之後，天地再變，復有姦雄如足利者，擁立其所私便，則今之自稱北朝臣子者，將胥率從之，是亦生一北朝也，吾懼焉，不可以不辯！」（原文）（註二二）

賴氏一則曰：「南則正，北則僞，事南者榮，事北者辱」，再則曰：「是祖宗之統也，非足利氏所得立也，」其尊王賤霸的心情躍然紙上。朱子學派大儒淺見綱齋，則不斷斷于神器之有無，而強調主賊邪正之分，其答跡部良顯書（註二三）曰：

「自後醍醐天皇至後龜山院未禪位之前，則南朝正統也。禪位以後，則天下無南北之分，則王統之系，自在後小松耳，其間足尊氏所立北朝光嚴、光明院，則皆爲非正統也。親房之神皇正統記爲此而著者。此一節尤君臣大義所關，春秋綱目所爲作也。然今觀世上所傳王代編年之類，率有以北朝爲本統者，有分南北爲兩京仍主北朝者，何所考之疎耶！故曰：不明主賊邪正之分，則欲不失君臣之義難矣。通鑑綱目凡例正統之部具詳其說。而綱目中天子播越流離之間，賊帥往往奉王子王孫以假號攘位者，朱子皆黜書之，而至於天子，則雖微弱必以正統歸之。皆可見。」（原文）

山上所述，可知淺見綱齋之區別主賊邪正，區別正統與非正統，完全是以朱子的通鑑綱目爲依據。

江戶時代學者所以力主南朝爲正統，目的就在否定武家政治，鼓吹尊王賤霸的思想。（註二四）各派學者，無論朱子學派、陽明學派、水戶學派，莫不高唱大義名分。如淺見綱齋著靖獻遺言八卷，被幕末勤王志士奉爲聖經。他嘗謂「看透大義二字，爲學者之大工夫」，言外之意，即指大義乃忠于天皇，而非忠于將軍，又說：「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所以他終身不應諸侯之聘。（註二五）淺見綱齋爲山崎闇齋的弟子之一，世稱京學，這派爲了高揚尊王的理想，甚至痛斥湯武革命，以湯武爲逆賊，如巖垣松苗註十八史略卷一，於夏桀王條論曰：

「漢語所稱逆賊，國言謂之「朝敵」，此是君子國之口氣，非畏強臣，而憚稱賊也。湯伐夏，我所謂朝敵者，史官宜書「子履弑其君桀」。：我邦爲朝敵者，其家必亡，不惟朝敵其家必亡，如專權違勅、失禮大朝者，亦必得奇禍。」（原文）又殷紂王條論曰：

「周發弑其君紂也。蘇東坡有武王非聖人之論，如孔子其國臣子，於禮不得言其罪而已，如孟軻曰誅一夫紂，賊黨私言也。」（原文）

藤田幽谷的學說，亦以重君臣之義爲骨髓，常以日本皇統延綿，冠絕四海，引爲誇耀（註二六）。他十八歲時著正名論，闡發君臣

大義，喧傳一時，其要旨歸于『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認為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幕府大將軍既攝天皇之政，不宜稱王，應稱為攝政，才名正言順(註二七)。至于史家賴山陽，以二十九年歲月著成日本外史一書，嘔盡心血，鼓舞勤王精神，尤以楠氏、新田氏諸篇，記述勤王事蹟，可歌可泣，使幕末勤王志士受到莫大的感化。鹽谷溫博士作『山陽先生百年祭賦』詩有句曰：『賴翁一管回天力，翼贊維新鴻業成』(註二八)，實非過譽之言。

尊王和攘夷是中國正統思想的二翼，江戶時代尊王論既盛行一時，攘夷論自然也就應運而起。原來江戶幕府創立以後，即採用朱子學說為官學，儒學更加普及，一般學者對中國文化無不五體投地的崇拜，尤其護國學派的表現特別露骨，荻生徂徠爲了翻譯華文，組織『譯社』，其『譯社約』最後一條云：

『凡會之譯，其要在以夏變夷也，不得以俗亂華也。』(原文)(註二九)

即明指中國爲「夏」，日本爲「夷」，他題孔子畫像時，也自稱「日本國夷人物茂卿。」此種失掉立場的民族自卑，結果便不免引起了思想界的反動。水戶學派首先大聲疾呼嚴內外之分，不能盲目的崇拜外國，如藤田東湖弘道館記述義云：

『神州(指日本)自神州，西土(指中國)自西土，彼指我爲外，我亦斥彼爲下。西土之教，尤嚴內外之分，我資而用之，亦不可不正上下之別。單就西土之教而論之，猶且然，況尊國體慎名分者，固皇朝所尤重耶！』(原文)

水戶學派本此精神修大日本史，竟抹煞史實，不承認隋以前朝貢中國的事實，武斷中日通使始于推古朝的對等外交。大日本史卷二四二：

『其國自隋以前，秦漢之裔雖有歸化者，而未聞有通使者。而彼史紀我風俗，虛實相半。至於載朝貢封爵等事，則古今所無；蓋當時置府任那，分帥臣鎮制之，時高麗雖稱臣朝貢，世奉彼正朔，受彼封爵，意爲任那帥臣者亦從而受其封號乎？抑鎮西奸民假名朝使貢調，以爲射利之資，而彼史從而錄之乎？要皆不足信！而其實通使者，則自推古帝朝始矣。』(原文)

大日本史又爲了國家體面，往往顛倒是非，如將隋、唐、宋、元、明列入諸蕃中，位屬新羅、高句麗、百濟、任那、新羅、渤海、琉球等國之下，仿通鑑綱目書法，以唐太宗書爲「唐主李世民」，元世祖書爲「元主忽必烈」，其崩改曰「殂」，日本外史仿之，以明神宗書爲「明主朱翊鈞」，李宣祖書爲「韓王李昞」，就是此種思想發展的結果。後來明治史家那珂通世，也對此種書法，甚表不滿(註三〇)。國學派思想家本居宣長，爲了歪曲日本古代朝貢外國的史實，著馭戎概言一書，竟指中國爲「戎」，因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首先朝貢魏室，竟武斷邪馬臺爲九州的異族熊襲，卑爾呼爲熊襲族的酋長，于是一唱百和，鶴峯戊申著「襲國僭偽考」，也拒絕承認邪馬女王爲正統，菅政友著「漢籍倭人考」，吉田東伍著「日韓古史斷」，都以邪馬台爲異族國家，主旨似乎都在爲了顧全國家的體面。在此種狂潮之下，自尊自大的風氣漸漸漫日本學界，古學派山鹿素行即其代

表人物之一，他稱中國爲「異朝」，認爲日本「自神代至今日正統一系」，「知仁勇三德本朝遠優于異朝」，日本方可稱爲「真正之中國」，所著配所隨筆云：

「我等以前好異朝（指中國）之書物，日夜勤讀新渡來之書物。其時不知不覺認爲異朝諸事皆宜，本朝（指日本）爲小國，諸事不及異朝。是不僅我等而已，古今之學者皆如此。但其後次第細思，本朝爲天照大神之苗裔，自神代至今日，正統一代，始知知仁勇三德本朝遠優於異朝，日本方可稱爲真正之中國。」（註三一）

他又狂妄地以日本以外的國家爲「四夷」，明言四夷「歸仰投化」，都是「中華（指日本）文明過化之功」，所著中朝事實化功篇論曰：

「地有內外，勢有遠近，人有華夷。故治教之道，自內而及外，先近而後遠，親華而柔夷。夫朝廷之上，國都之內，何預四夷之遠疎乎？然內之和，近之治，華之溢，知之明也，德之充也，無不通無不感者。道之精妙也，四夷不遠千里之險，萬頃之渺，歸仰投化，畢獻方物，不期其然而然者，中華之文明，聖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與之，實過化之極功也。」（原文）

山鹿素行的誇大，不一而足（註三二），稱之爲東方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亦不爲過。稍後，山崎闇齋及其門人淺見綱齋的自大排外精神，也很徹底。山崎闇齋曾對弟子們說：

「假使唐國企圖征服日本，如採軍事行動，即堯、舜、文、武帶兵來攻，也應徹底的加以擊潰，這是大義；如以禮義德化，也應警惕被其同化，是即春秋之道也，我天下之道也。」（註三三）

淺見綱齋更把山鹿素行和國學派的中國夷狄論大事宣揚，所著靖獻遺言講義說：

「有的學者看到唐人之書稱日本爲夷狄，有說不出的難過。這真是所見者小！天下雖大，那裏還有像自己出生的國家那樣可驕傲的中國呢？……也許有人說，聖人也以我們爲夷狄呢？但那是唐國的聖人，從唐國如此說，如果是日本的聖人，就會以此處爲中國，而以彼土爲夷狄了。」

中國辨華夷的思想，在一定的限度內，可以刺激國家意識的覺醒，過了某種限度，就成爲後日日本軍國主義的溫床了。

隨着攘夷思想的展開，實際的攘夷運動也日漸激烈。寬政九年（一七九七年），藤田幽谷上藩主德川治保策，有云：

「北溟黠虜，窺覲神州（指日本），常有圖南之志，我藩負海作邦，隣接強寇，尤不可不有所預備，豈閣下因循姑息，玩歲愒日之時耶？……」（原文）

這是攘夷論的嚆矢，爲美艦訪問浦賀打開日本門戶前五十六年的事情。當時俄人正在北方虎視眈眈，躍躍欲試，所以幽谷提出警告。幽谷之子東湖作正氣歌，也有「誓欲掃胡塵」之句。及至美國提督柏理（Perry）訪日前後，攘夷派勢燄更盛極一時。當

(328)

時勤王黨亦以攘夷爲目標，水戶浪士發動的多次義舉，無一不是打著攘夷的旗幟，如一八六〇年刺殺大老井伊直弼的浪士所提出的「自訴狀」，指斥井伊的罪狀云：

「就對外虜而言，震于其虛言恫嚇的猛勢，釀成神州之大禍，不但有辱國體，重增主憂，而且居然迫上讓位，實奸邪之至，天下之大罪人也！」

又東禪寺起事的浪士所持自述書云：

「不忍袖手旁觀，爲夷狄所辱，故基于尊攘大義，下此決心！」

又阪下事件的斬奸狀云：

「正尊王攘夷之大典，明君臣上下之誼，與天下同生死，是則臣等擲身命，誅戮奸邪所懇求于幕府諸有司之微意也。」

(註三四)

中國敗于鴉片戰爭的一年，玉木文之進創辦松下村塾，後來維新人才出其門下者頗不少，松下村塾記有曰：

「抑人之所最重者，君臣之義也，國之所最大者，華夷之辨也。……生神州之地，蒙皇朝之恩，內失君臣之義，外遺華夷之辨，學之所以爲學，人之所以爲人，其安在哉！」（原文）（註三五）

明治二年，日皇賜國史局總裁「御沙汰書」，仍殷殷叮嚀曰：

「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誼，明華夷內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綱常。」

所以明治維新，從某一角度看，也可說是中國正統思想——尊王攘夷精神在日本長期浸潤的結果。

三

韓國的地理、人種、歷史，都和中國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就地理說，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和北朝鮮沿岸，隔着渤海和黃海形成一個不規則的半圓形，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一個大湖，所以古代沿海民族的遷移，文化的交流，極其方便。（註三六）就人種說，古代朝鮮漢江以北的居民——扶餘、濊、貊、沃沮、句麗等族，都是從中國境內遷入，（註三七）而漢江以南的馬辰弁三韓，也混有不少漢人的血統，如辰韓傳有大批秦人移入，故亦名「秦韓」，馬韓傳一時曾被亡國後的箕準攻佔，稱王其地，（註三八）而馬韓的後身——百濟，也自稱系出扶餘。就歷史說，箕子封於朝鮮的傳說已流傳三千年之久，當有某種事實的根據。（註三九）箕子朝鮮之後，繼以衛滿朝鮮，也是漢人建立的政權。雖然箕子朝鮮之前，又有檀君朝鮮的傳說，但這傳說發生甚晚，（註四〇）韓國過去史家多有不承認的表示，如李朝史家安鼎福撰東史綱目，一面斥「檀君之說，荒誕不經」，一面尊箕子爲正統，徐居正撰東國通鑑，也以檀君傳說爲可疑，而特尊箕子，贊曰：

「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故曰詩書禮樂之邦，仁義之國也，而箕子始之，豈不信哉！」（註四二）由於上述種種關係，所以韓人一向仰中國爲本位，自認爲中國的分支，這是韓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包。

中國自漢武帝以後，在朝鮮半島設置郡縣約四百年，西晉末年，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崛起，中國退出朝鮮半島，自此始有內外之別。高句麗和百濟二國，於四世紀八十年代分別設立太學，新羅何時設立太學已不可考，至遲六世紀初年似已輸入儒學。隨着儒學的興隆，春秋大義漸深入人心。新羅法興王二十三年（五三六），新羅初建年號，因有違春秋精神，曾受到韓國史家的猛烈抨擊（註四三）。至眞德王四年（六五〇），新羅始行唐永徽年號，這是韓國奉行中國年號之始，自此韓國歷代皆行中國年號，一直繼續一千二百餘年，至甲午戰爭後韓國纔自建年號。新羅之行中國年號，正是爲了貫徹春秋大一統主義。高麗史家金富軾撰三國史記論其事曰：

「三代更正朔，後代稱年號，皆所以大一統，新百姓之視聽者也，是故苟非乘時並起，兩立而爭天下，與夫姦雄乘間而作，覬覦神器，則偏方小國，臣屬天子之邦者，固不可以私名年。若新羅以一意事中國，使航貢篚相望於道，而法與自稱年號，惑矣。厥後承愆襲繆，多歷年所，聞太宗之誚讓，猶且因循，至是然後奉行唐號，雖出於不得已，而抑可謂過而能改者矣。」

新羅又因王制有「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之說，安於諸侯之分而立五廟，因有「天子祭天地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之說，安於諸侯之分而祭社稷。三國史記卷三十二雜志一祭祀：

「按新羅宗廟之制，……至第三十六代惠恭王（七六五——七九），始定五廟，……第三十七代宣德王（七八〇——八四〇），立社稷壇，又見於祀典，皆境內山川，而不及天地者，蓋以王制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曰：天子祭天地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故不敢越禮而行之者歟。」

這都是新羅尊天子、貴中國的表現。

新羅之後的高麗王朝，興於五代，亡於明初，共享國四百七十餘年，其間宋遼金元先後興起，因此高麗曾先後對宋遼金元稱臣朝貢。自宋室南渡，正統論盛極一時，高麗與宋會維持悠久的邦交，自然難免受到此種思潮的影響。尤其構成正統論基礎的攘夷思想，似曾給與高麗相當的刺激。原來韓人素以繼承正統華夏文化自豪，對於華夏以外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概視爲「野人」、「蕃夷」、或「胡虜」，加以輕蔑，如今却迫於淫威，不能不向他們屈服，自然心有不甘。有人認爲高麗朝開始出現檀君傳說，決非偶然，其稱檀君與中國聖君唐堯同時，乃欲誇示文化的優越，藉以喚起民族的自尊心，而稱檀君定都於平壤，也有深刻的寓意，因爲平壤曾爲蒙古所佔領，乃欲藉以警惕國人，銘記祖宗的發祥地。（註四四）所以檀君傳說，也可能是攘夷思想的產物。至於尊王思想，高麗朝也有具體事實的表現。如忠烈王二年（一二七六），將王的「宣旨」改爲「王旨」，「

朕」改爲「孤」，「陛下」改爲「殿下」，「太子」改爲「世子」，王之廟號，元宗以後，亦不附「祖」或「宗」，而稱爲某王，凡對中國稍有僭越者，亦一一更改。所以後來李朝修高麗史，亦以高麗王室入世家，高麗史凡例云：

「按史記天子曰紀，諸侯入世家。今纂高麗史，王室爲世家，以正名分。」

這就是說，論大義名分，高麗不過中國天子統御下的一國，故只能安於諸侯之分，列入世家。

李朝五百年間，是理學的全盛期，隨着朱子學說的傳播，通鑑綱目大爲流行。李朝上下對通鑑綱目一書莫不推崇備至，如李正宗教令云：

「春秋，聖人大一統之書也，三王之心法，待孔夫子而明，夫子之筆法，待朱夫子而著……」（註四四）

又柳義孫綱目通鑑訓義序云：

「朱文公綱目，祖春秋之筆，其文則史，而義則經也……竊謂史籍之行於世者多矣，莫詳於通鑑，而莫要於綱目，實天下萬世之龜鑑也。」（註四五）

由於通鑑綱目的流行，綱目代表的正統思想漸形普及，自此朝鮮編年體的史書，無不遵奉綱目的書法。試看東國通鑑凡例：

一、三國勢均力敵，不可主一，故依綱目無正統例，以立國先後，分註其年，稱其紀曰三國紀。新羅統一之後，始大書其年，稱某王紀。

一、每年必先書中國年號，尊之也。新羅嘗行年號，僭擬中國，故削之。

一、善德、眞德、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以訓後也，故黜而稱主。

一、辛禔依王莽例，止書甲子，書其年於註。昌立本未久，附恭讓元年。

從這幾條凡例，可看出朝鮮曾受到中國正統論怎樣深刻的影響：本於春秋大一統之義，故先書中國年號，這是尊王主義，也就是尊中國主義；中國正統論反對割據，故韓國史家模仿綱目，以三國時代爲無統；中國正統論反對篡奪，故韓國史家以善德、眞德、眞善三女王視同呂后、武后，黜而稱主；又仿王莽例，以辛禔、辛昌爲篡賊。綱目思想，旨在宣揚大義名分，制裁亂臣賊子，故辛禔父子尤爲李朝學者指責的目標。原來高麗三十一代國王恭愍王，寵用玉川寺僧遍照，委以國政，改名辛禔。王常以無子爲憂，來往辛禔府中，幸其婢，生一子名牟尼奴，後辛禔圖謀不軌被殺，王召牟尼奴入宮，賜名禔。不久王被弑，明德太后結權臣立禔爲王，及禔被流放，其子昌繼位。由於禔昌父子血統可疑，初李朝儒臣修史，皆書其名，至李世宗時修高麗史，曾書爲王，但旋即採納史臣建議加以改正。世宗實錄卷一二四己巳三十一年（一四四九）四月乙卯條：

「春秋館（啓）：前修高麗史，據漢少帝及宋蒼梧三故事，僞朝辛禔父子皆稱王。謹按……恭讓之立也，舉國君臣議曰：

禍昌本非王氏，不可以奉宗祀，又有天子之命，當廢假立真，定昌府院君瑤，乃太祖正派，宜爲恭愍後，遂以定妃教奉王即位，以繼正統，斷以大義，廢禍昌爲庶人，尋正典刑，而我太祖實主是議，其所以聲僭竊之罪，以致天討而絕之者嚴矣。今若猶王禍昌，使逆賊之孽，混於三十二代之列，而無以別之，則非但乖於大義，乃有違於太祖正名之義矣。諸侯廢置，在於天子，而況禍以他姓竊據，而上爲天子所絕，下爲國論所廢乎！漢王莽聘詐肆姦，稱假卽真，悉藉太后，竊位南面，十有餘年之久，漢書斥書其名，降爲列傳，以著篡盜之罪，禍以賊阬餘孽，竊據神器，父子相傳，窮凶極惡，罪浮於莽，安可稱王，以亂名分乎！前此鄭道傳等修史之時，名書禍昌，其後河崙、柳寬、卞季良等讎校，尹淮重撰，亦皆因之，豈無所見哉。乞於今修高麗史，禍昌父子悉依漢書王莽例，以正名分，以懲亂賊，以嚴萬世之法。從之。」

上文說明黜書辛禍父子，是爲了「以正名份，以懲亂賊」，這正是中國正統論精義之所在。

李朝的尊王主義，也就是尊中國主義，已如前述。李朝五百年間，始終謹守事大之禮，仰奉中國皇帝如周之天子，自視如周之諸侯，不敢稍有僭越行爲。如李世宗時，禮曹因天旱成災，奏請祭天祈雨，但世宗因祭天乃天子之事，終不願僭禮。世宗實錄卷一〇五甲子二十六年（一四四四）七月丁卯條：

「禮曹啓：今旱氣太甚，凡所祈禱，靡神不舉，至今不雨，臣等反覆思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雖名有其分，然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故人窮反本，事有迫切，必號於天，且變而得中，是亦禮也，姑從權典，祭天祈雨，以救旱乾之災，何如？上曰：如此僭禮之事，予不爲之矣。敢以祭天之議來啓者，承政院毋得啓達」。

後來明亡於清，朝鮮爲了感激明神宗的援韓，欲爲明神宗立廟，但因諸侯祭天子，於禮爲僭，初仍表示躊躇。肅宗實錄卷四十甲申三十年（一七〇四）九月癸丑條：

「李奎奏曰：神宗皇帝立廟之教，實是曠絕千古之盛節，羣下孰不感動。……論者或以爲諸侯祭天子，於禮爲僭，以常道言之則然矣，然臣意則與此有異。昔漢章玄成之言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其分固截然，而禮本有經有變，要之本乎人情，合於天，則若嫡子有故，不得祭父，則支庶代行於其家，亦是人情之所不容已也。天子太廟既不血食，而一隅偏邦，還有沒世不忘之誠，追思而祭之，亦何異以支庶代祭其父乎？……今若舉東方爲大明之區域，而立天子之廟，則豈不盛哉！」

結果，終以天子太廟既不血食，偏邦追思而祭之有何不可，於肅宗三十一年築「大報壇」於禁苑，奉祀明神宗，英祖時，並以明太祖及明思宗附祭之。正祖時，又勅撰尊周彙編，表示對明室的尊崇。這些固然出自感激明軍援韓之情，其實也可說是春秋大一統精神陶鑄的結果。

朝鮮對待明室固然很恭謹，但對待其他民族却抱着自尊自大的態度，這正是基於春秋辨夷夏的精神。明亡於清，朝鮮仍念

念不忘爲明復仇。肅宗實錄卷二元年(一六七五)乙卯正月己巳條：

「嗚呼，丙子之事(指皇太極崇德元年之伐韓)，天不弔我，禽獸迫人，棲我於會稽，厄我於青城，虔劉我赤子，毀裂我冠冕，當是時，我先王忍一死爲宗社，捐一恥爲萬姓，而沫血飲泣，含羞拊心，思一有所出，以至於今，天道屢周矣，人神憤盈矣。今日北方之聞雖不詳，而醜虜之竊據已久，華夏之怨怒方興，吳起於西，孔連於南，鄭窺於東，……我以比隣之邦，……而不於此時興一旅，馳一檄，爲天下倡……不徒操刀不割撫機不發之爲可惜，實恐無以奏假於我祖宗我先王而有辭於天下萬世矣。」

文中指滿清爲「禽獸」，爲「醜虜」，充分反映出其仇視之情。朝鮮雖爲滿清威力所屈，不得已奉清正朔，但「官文書外，雖下賤無書清國年號者」，(註四六)國內私事仍一直沿用明崇禎年號。李朝漢學家朴趾源，曾指斥滿清之尊朱子，並非真識朱子之學，不過爲了「鉗天下之口，而莫敢號我爲夷狄也。」(註四七)但韓人心目中的夷夏之別，究竟不外文化水準高下之別，所以朝鮮當初雖很仇視滿清，後來滿清漸取得正統文化保護者的地位，朝鮮又轉而親清了。到了李朝末年，西方勢力入侵，大院君堅持「洋夷擊攘」政策(註四八)，雖然原因不一，但主要的顯然仍當歸因於中國攘夷思想的影響。

四

自秦始皇置象郡，越南開始隸於中國版圖。秦末，中原大亂，趙佗據地自立，是爲南越。漢武帝時，滅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於北越中越一帶，自此歷東漢六朝至隋唐，越南爲中國郡縣達一千餘年之久，越史統稱之曰北屬時期。在這悠長的期間，越南由中國中央政府派官吏直接統治，施政設教完全和內地州郡無別。但越人自有悠久的歷史傳統，雖然逐漸漢化，其民族意識究不易於催眠，所以趙佗雖爲中原漢人，只因他首先據地獨立與中原對抗，也受到越人異常的推崇。大越史記特爲趙氏立本紀，贊曰：

「遼東微箕子，不能成衣冠之俗，吳會非泰伯，不能躋王霸之強，大舜東夷人也，爲五帝之英主，文王西夷人也，爲三代之賢君，則知善爲國者，不限地之廣狹，人之華夷，惟德是視也。趙武帝能開拓我越，而自帝其國，與漢抗衡，書稱老夫，爲我越倡始帝王之基業，其功可謂大矣！」(註四九)

上文中謂「善爲國者不限華夷」，可見春秋辨別華夷的思想，早已引起越人強烈的反應。郡縣時期，由於中原派去的官吏常多貪污擾民，也使越人受到很大的刺激。史家黎文休曾慨然曰：

「觀史至我越無主之時，爲北人刺史之無清行者所困，北京地遠，無所告訴，不覺愧感交集，冀見精誠如後唐明宗時焚香祝天，願天爲我越早生聖人，自帝其國，以免北人之侵漁者也！」(註五〇)

由於越人渴望『早生聖人自帝其國』，所以對於首先倡義獨立的越人徵側徵貳姊妹，無不表示五體投地的崇拜。大越史記外紀卷三屬東漢紀史臣論曰：

『徵側徵貳以女子一呼，而九真、日南、合浦及嶺外六十五城皆應之，其立國稱王，易如反掌，可見我越形勢足致霸王之業也。惜乎，繼趙之後，以至吳氏之前，千餘年之間，男子徒自低頭束手，爲北人臣僕，曾不愧二徵之女子，吁，可謂自棄矣！』

不過漢人根深蒂固的統治，究非越人原始性的反抗所能輕易推翻，所以在時機成熟之前，越人只得暫時致力於自身政治地位的改善。漢獻帝時，越人李進任交趾刺史，代表越人上言：『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士，未嘗獎勵遠人。』這是越人首次公開要求漢越政治上的平等待遇。因此，漢廷曾令『交趾之有孝廉茂才，許除補屬州長吏，不得任中州。』不久，又因越人李琴的請求，以交趾茂才一人爲夏陽令，孝廉一人爲六合令，後來李琴本人於晉時仕至司隸校尉。(註五二)可見中原鑒于越人的民族意識，亦曾相當滿足越人政治的要求。但越人民族意識發展的結果，終於招來了獨立時代。

越南之獨立建國，自越人吳權始。吳權乘五代之紛擾，於後晉天福四年(九三九)敗南漢軍於白藤江，遂自立爲王，於是越南進入獨立時代。但是獨立伊始，王權未固，越人尙不知國王之尊，所以吳權死後，楊三哥雖受顧命立昌岌，不久即逐昌岌而自立，足見當時越人尙未明儒家『君君臣臣』之道。後日越史家黎嵩痛論其事曰：

『嗟夫，自有天地，即有綱常，父爲子綱，君爲臣綱，萬古截然，而不可紊……三哥乃吳昌岌之舊臣，背其顧托之言，逐其君而自立，是以臣而叛其君，又爲後主所戮。亂賊之輩，生前則不容天地之間，沒後則難逃春秋之法，故史臣筆之通鑑，深致意於其間焉。』(註五二)

吳權雖然首先獨立建國，但因當時君臣名分未嚴，故越史家仍不肯以正統相許，如黎崱安南志略以吳權入「五代時僭竊」，吳士連大越史記雖承認吳氏已有「帝王之規模」，亦仍以之列入「外紀」。(註五三)越南正統之君，越史家皆託始於丁部領。(註五四)黎嵩越鑑通考總論曰：

『丁先皇因吳國之喪亂，平十二使君，天與人歸，輿圖混一，……擬制朝儀，定立軍旅，我越正統之君，實自此始。』

不過丁部領雖自尊爲「大勝明皇帝」，却仍未深明中國帝王之道，觀其立王后五人，爲越史開一惡例，即其明證。殊不知「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儘管妃嬪不厭其多，正后決不能有二個，於此，越史家亦曾慨乎言之(註五五)。丁朝之後爲前黎朝，前黎朝之後爲李朝。李朝成立於北宋，至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一一七四)封李天祚爲安南國王，中國纔正式承認安南爲國，距越人開始獨立建國，已二百餘年。南宋時代正統論沸騰一時，安南自不免受其餘波的激盪，似乎越人直至此時纔真正了解「天無二日，國無二王」的意義，觀李朝初年仍不知「春秋之法」，未踰年而改元(註五六)，至此時纔糾正錯誤，實行踰年改元，即其明

(334)

證。大越史記本紀卷四李紀三：

「寶符元年（一一七六）春正月，改元，大赦。史臣吳士連曰：高宗以去年七月卽位，至是始改元者，蓋有蘇憲誠輔政，能復古禮也。」

陳朝代興，由於朱子學說的輸入，陳太宗開始詔學者講四書（註五七），因此，儒家的大義名分說更加深入人心。陳太宗末年，元軍大舉入侵，國都淪陷，君臣遠遁，但王室中的地位却並未因之動搖。後來元世祖因陳日烜（仁宗）抗命不朝，立日烜之叔遺愛爲安南國王，並以新附軍千人送遺愛回國，却得不到國人的擁護，結果爲日烜所殺。這是越人已用行動來表現其尊王精神。

到後黎王朝，更帶來了尊王思想的高潮。原來陳朝末年，曾演出一幕震驚內外的篡奪鬧劇。權臣黎季犛廢帝（昞），立順宗（顯），越十年，迫帝禪位太子案（少帝），改元建新，令先帝入居道觀，進毒藥害之不死，旋遣人縊殺之。太保陳沆、上將軍陳渴眞等謀誅季犛，事洩，宗室臣僚等三百餘人皆被殺。季犛自稱「國祖章皇」，居仁壽宮，儼如太子，服色皆用黃色，文書稱「奉攝政國祖章皇」，以子漢蒼爲「攝太傅」。建新三年（一四〇〇），季犛立其子漢蒼爲太子，迫帝禪位，自立稱帝，謂出帝舜裔胡公滿後，改姓胡，國號大虞。旋傳位於其子漢蒼，自稱太上皇。開大元年（一四〇三），漢蒼自署權理安南國事，奉表朝貢於明，稱陳氏子孫滅絕，彼以陳氏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於今四年，請襲封爵，明成祖被其蒙蔽，下詔封爲安南國王。但不久真相大白，明廷即派大軍討篡逆之罪，俘季犛漢蒼父子，佔據安南，重置郡縣。後來越人黎利經十年的苦戰，纔逐出明軍，光復越南，建立後黎王朝。季犛父子的篡奪行爲，曾給當時越人莫大的刺激，故當代編撰的史書，於季犛漢蒼皆仿漢書王莽篡例，斥其僭號，如史臣吳士連痛論其事曰：

「昔夏徵舒弑陳靈公，中國不能討，楚子入陳，殺而轅諸栗門，春秋與其討也。胡氏弑陳順宗而篡其國，陳沆、陳渴眞諸人，謀誅之而不能克，身死之後，七八年間，無有能再學者，自謂國人無敢誰何。然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而天討之在天下，不容一日捨也。國人誅之，不克，鄰國人誅之，可也；鄰國人誅之，不克，夷狄誅之，可也；故夫明人得以誅之也。至於假仁義，荼毒生靈，則是一殘賊爾，故我太祖高皇帝，又得以誅之。」（註五八）

後黎王朝成立不過百年，又演出另一幕震驚內外的篡奪鬧劇。自黎太祖（利）九傳至黎昭宗（諱），莫登庸擅權，光紹七年（一五二二），登庸謀弑諱，諱逃清化，登庸立皇弟椿，改元統元。統元六年（一五二七），晉封登庸爲安興王，加九錫。同年，登庸迫帝與太后自盡，篡位稱帝，國號大越。黎氏後裔據清化，仍稱帝號，與莫氏對抗，但勢力較弱。登庸在位三年，傳位於其子登瀛，自稱太上皇。再越八年，因明廷有興師問罪之意，登庸父子哀辭乞降，明世宗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但安南形式上雖改爲都統使司，實際不受明廷統轄，仍與獨立王國無異。莫氏五傳至莫茂洽，國都爲黎氏攻陷，

遂一蹶不振。莫氏與黎氏對立六十七年（一五二七——一九三），可說是越南史上的南北朝時代，但由於中國正統論的影響，越人皆奉黎氏爲正統，而以莫氏爲僭僞，即於黎氏中斷無年號可紀之際，不得已而書莫氏年號，亦仿綱目例，分註兩行，以明其非正統。大越史記本紀實錄卷六附莫僭紀莫僭明德二年正月條：

「前年莫氏雖已受禪，猶書黎朝統元六年爲正。自茲以後，黎朝無年號可紀，乃以莫氏明德年號，分註兩行，不得書正統，以明篡僞也。至癸巳年，莊宗復起兵于哀牢，國中雖未盡復，然以正統書之，蓋以明夫君臣之分如此也。」

莫氏之速亡，也許正由於當時越人顧及君臣名分不願給與支持的原故。由於黎朝先後有權臣胡氏和莫氏之篡奪，自此史家無不致力於正閏之辨（註五九）。黎朝史臣登柄論正統曰：

「古人有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粵昔炎帝啓封南國以來，歷代明王賢主，有攻守而併吞之，有傳授而世守之，皆繼世而王，以有位號，乃以正統書之，曰本紀，曰正紀，曰前紀，曰後紀，曰中紀，曰末紀，皆其順而已。至若悖逆篡弑而強自立，雖有名號稱者，皆名不正，言不順也，則編之爲附紀，是其逆而已。……世降而下，亂起紛紜，迭有興廢，不必言之。自趙越王之起，則本前李南帝之臣也，繼南帝以有其國，而後始即政稱王，以其臣能代君行政，如此順也。丁先皇平十二使君之亂，而併有之，少帝微弱，弗能禦敵，以國事委之大將黎桓，而黎桓承丁后之傳，以有天下者，順也。及李之代黎，陳之代李以有位者，皆其順也。然則趙黎李陳之四君，皆乘國中無主，或因羣臣所請，或因女主之傳授，國人之尊服，天與之，人歸之，以有天下，皆其順取以有之也。於莫則不然，觀其所爲者，登庸不過黎朝之一大臣也，當黎朝主弱臣強之際，登庸能師古昔之聖臣賢相，尊王庇民，如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其彰彰然偉績，庶可嘉焉，何不效此，而寧反其道，是未免逼主稱禪，篡國弑君，以圖自立。及其有國也，殆六十七年之間，所謂成如王莽，終不免誅夷，實於漢之曹，於陳之胡，皆其迹也，是愚所謂其逆取而有之也，故不得書爲正統也。」（註六〇）

登柄以順逆定統之正與正，認爲「悖逆篡弑而強自立，雖有名號稱者，皆名不正，言不順」。不能稱正統，這正是中國尊王思想的精髓。

中國正統思想的另一翼——攘夷思想，到了後黎王朝也更加發揚光大。原來後黎王朝之前的陳朝，由於元軍的屢次入侵，已深深刺激越人的民族意識，如王子陳益稷投降元朝，一日在鄂州遇越使者阮代乏，代乏竟大大加以奚落，使得益稷無地自容，便是著名的史例。（註六一）陳黎之際，明廷派兵討伐胡季犛父子，亂平後竟不顧越南民情佔據其地，陳氏遺裔陳頤（簡定帝）陳季擴（重光帝）先後起兵，均歸失敗。最後，黎利經十年的苦戰，終於收復越南。長期民族鬭爭的結果，越人民族意識之昂揚，可以想見。大越史記本紀實錄卷一黎紀一太祖高皇帝贊曰：

「帝奮起大兵，削平明賊，十年而天下大定。……胡篡陳祚，明人南侵，郡縣我疆域，臣妾我兆庶，法峻刑苛，賦繁役重

(336)

，凡中國（指越南）豪傑之士，多陽假以官，安排於北。帝智識過人，明而能剛，……奮起義兵，欲除大亂，嘗謂人曰：

我之舉兵討賊，非有心於富貴，蓋欲使千載之下，知我不臣虐賊也。……」
文中一再斥明爲「賊」爲「虐賊」，其仇恨之情躍然紙上。基於此種民族感情，故當時史家無不特別嚴辨內外。如吳士連撰大越史記凡例，一則曰：

「凡我越人憤北人侵暴，因人心甚惡，攻殺郡守以自立，皆書起兵稱國，不幸而敗亡者，亦書起兵以予之。」
再則曰：

「陳末二胡之後，明人併據，凡二十年，止以四年屬明者，蓋癸巳以前，簡定、重光猶係陳緒，戊戌以後，我朝太祖高皇帝已起兵，故不屬明者，正國統也。」

於此，可見越人已利用中國的正統觀念，轉而自尊其國。當時越人竟不顧秦漢以來的歷史事實，聲言「自天地既定，南北分治，北雖強大，而不能軋南。」（註六二）甚至否認越南古爲中國藩屬，如黎聖宗（瀨）曾諭御史台吳士連曰：「爾謂我國是古諸藩，是爾從死之道，無君之心」（註六三）。當時越人對於文化母國——中國，尙且採取如此倨傲的態度，那末對於其他鄰近的民族，當然以夷狄視之了。如黎聖宗親征占城詔曰：

「蓋自古夷狄爲患中國，故聖王弧矢以威天下。九黎亂德，黃帝治兵，三苗不恭，大禹誓衆，雖用兵，乃聖人之不得已，而立法，使愚婦之所共知。……於戲，窮寇刳羊無血，可稽六月之師，南陲見豕負塗，不待七旬之格。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註六四）

又征益蠻詔曰：

「我國家混一區宇，統御華夷，……益賊琴公，介居裔服，……野性難馴，……朕憫一方之生聚，寬萬死之罪愆，置郡縣而甸彼疆，易衣裳而縻我爵，頑冥木石，孤負乾坤，縱溪壑之貪饕，倒冠屨之名分，……期以今年八月，分道進兵，聲罪致討。」（註六五）

又征哀牢詔曰：

「朕丕繩祖武，光御洪圖，蒞中夏，撫外夷，廣大禹敷文之治，闡帝猷，開王志，迪周文關國之謨。惟此老撾，界居西徼，……肉魚我宇宙，瓜豆我提封，……豈疆場一時之患，實宗社萬世之仇。……」（註六六）

從上面各詔書，足見越人常自命爲「中國」「中夏」，以其他民族爲「夷」爲「蠻」，並自命「統御華夷」，這顯然是由於越人長期接受春秋辨華夷思想洗禮的結果。

越南史上的最後一個王朝——阮朝，於十九世紀初成立，已開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但仍以中國文化爲主體，所以中國

的正統思想仍在當時越南思想界佔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如史家張登樞曾由中國正統言及越南正統，認為丁李陳黎阮五朝皆越之正統，尤以阮朝「誕膺正統」，足與中國「商周比隆」。他說：

「竊惟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代有製作，各有一代之史，而史之有正編者，大一統之義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自契以後相傳十有三世，至于帝昀武湯，正域彼四方爲商紀，正統之始。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建篤基，勤千數百年，至于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爲周紀正統之始。我越丁李陳黎之興，莫不具有載籍，而求其肇造於前，光大於後，以誕膺正統與商周比隆者，蓋未有如熙朝（阮）之盛美也。」（註六七）

阮朝開國，雖多少得助於法人，但其對西人的基本態度，仍保持過去對夷狄的傳統。大南實錄正編卷二十四嘉隆三年（一八〇四）六月條：

「紅毛這使獻萬物，表求通商，又請留國人于沱瀾，往來商賈。帝曰：先王經理天下，夏不雜夷，此誠防微杜漸之意也。紅毛人狡而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聽其留居。厚賜遣之。」

嘉隆帝以「夏不雜夷」的理田，不許西人留越通商，這也是當時中國對西方的態度。但嘉隆帝對法人究竟還是很敷衍的，後來明命帝不滿嘉隆帝的親夷策，更進一步確立攘夷方針，紹治帝及嗣德帝繼之，都採頑強的拒法態度。嗣德十一年（一八五八）以後，法人謀越口急，步步推進其軍事侵略，最後終於爆發中法戰爭，迫中國退出了越南，於是越南亦隨之而亡。自越南亡國前夕，重臣阮文祥等提出「尊皇說」，擁立咸宜帝組織抗法政府，此後「勤王運動」與反法運動便不斷平行的展開。十九世紀末，越南各地的復國運動，如平定的梅春同，廣南的阮孝，×安及河靜的潘廷逢，東京的阮善述，以及進行遊擊戰五年之久的提探等，都是打着勤王攘夷的旗幟。直至二十世紀初年，黃花珠組織「北圻勤王黨」，結合舊王朝的遺臣及漢學家，在北圻各地，進行頑強的反抗戰爭，也仍是從勤王攘夷說而出發的（註六八）。由此可知中國正統論給與越南的影響，是怎樣深遠了。

五

我們試就中國正統論給與日韓越的歷史影響加以檢討之後，得到幾點認識：

1. 過去許多人都專找正統論的缺點，有人說：「把正統與道統的眼鏡摘下，看我們的歷史，在皇權與儒術結合之下的中國政治，一千多年的歷史，很少清明過。」（註六九）也有人說：「這種思想，固然有助於民族觀念之發育，其弊乃轉而促成排外的、自我的、狹隘的民族概念，延誤了懷抱世界思想的民族的出路。」（註七〇）顯然這都只是片面的看法。從歷史上看，正統論不但在中國，就對日韓越國家的成長，也曾作過相當重大的貢獻。

2. 構成正統論基礎的尊王思想，提示各國重視大義名分，使各國野心份子不能不有所顧忌，因而加強了各國內部的向心力

(338)

，多少有助於各國歷代政局之穩定。

3. 構成正統論基礎的撰夷思想，提示各國留意辨別內外，因而引起各國迎頭趕上先進國的欲望，喚醒了各國的民族意識，啓發了各國發奮圖強的精神。

(註一) 古來論正統者頗多，如唐皇甫湜東晉元魏正統論(唐文粹卷三十四)，宋歐陽修原正統論，明正統論(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九)，蘇軾正統論上中下(東坡文集卷十一)，鄭思月古今正統大論(心史)，明方孝孺樞統、後正統論，清魯一同正統論，今人梁啟超論正統，柳詒徵論史統，日人那珂通世支那

正統論考等，但皆各執一詞。

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註二) 正統論下。(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九)

(註三) 史通探蹟。

(註四)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

(註五) 公羊傳成公十五年。

(註六) 孫復春秋尊王發微。

(註七) 見日本書紀卷二十四皇極天皇元年正月及三年十一月條。

(註八) 見日本書紀卷二十五孝德天皇大化二年三月二十日條。

(註九) 據日本書紀卷二十四，皇極天皇二年，大化革新的領導人中，大兄皇子和中足鎌足，曾從留隋學生南淵清安學「周孔之教」。

(註一〇) 見三品彰英、小林行雄、橫田健一著日本之黎明頁一三六。

(註一一) 日本書紀卷二十二推古十六年九月條。

(註一二) 見那珂通世外交辭史頁三四、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頁一五一。

(註一三) 志田不動齋主張與高表仁爭禮之日本主權，可能是聖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子，(見東洋史上之日本頁五四)但僅屬臆測，並無實據。

(註一四) 見中山久四郎支那史籍上之日本史頁一七九引(大日本史講座第十七冊)。

(註一五) 見史學及東洋史之研究頁六四。

(註一六) 漢書叙傳：『班彪王命論曰：『審神器之有授。』注：『神器：神器，帝位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巨猶開堂，衍并神器。』綜注：『神器，帝位也』

(註一七) 元亨釋書卷十七。

(註一八) 大日本史卷七十二後小松紀贊。

(註一九) 見加藤繁大日本史與支那史學(本邦史學史論叢下卷頁八九四)。

(註二〇) 修史始末天和三年八月條引安慎澹泊手簡云：『五十年前，僕始入史館時，人見又在爲總裁，出所謂紀傳者以示僕，北朝五主，降爲列傳，足利之黨，

悉書賊。當時受讀，漫然不省其可否。後一二年，稍有所見，竊謂設如異邦革命之世，修前代之史，其書法或然，今皇朝一姓相承，響之所謂南北兩宗，

均之太祖之胤，而所謂北朝五代，即今天子之祖宗也，豈可降爲列傳乎？然後生晚輩，口欲言而喘喘，嘗與佐佐三善，竊語以此語，及介三與吉弘

左介爲總裁，僕亦與議定修史義例，侃侃而言，遂得書後小松紀首。(元文元年答打越樸齋手簡)』(原文)

(註二一) 賴山陽全書第六冊頁三二八(日本政紀卷十四後龜山天皇條)

(註二二) 見網齋先生答問書。

(註二三) 江戶時代，一般稱德川幕府爲「賴府」，京都王宮爲朝廷。當初的土朝論，無爭含有「尊王敬朝」的意義，後漸演變爲「尊王賤朝」或「尊皇卑幕」的

思潮。參閱戶田浩曉尊王卑幕的傳統與幕末王霸論的特質(國史論叢頁四五九—九〇)。

(註二四) 近世日本之儒學(德川公繼宗七十年祝賀紀念)頁四一六、四一七。

(註二五) 會澤安撰及門遺範云：『先生尤重君臣之義，恒語人曰：天祖垂統，天孫繼承，奉三器以昭臨宇內，皇統縣縣，與天壤無窮，實如天祖所命，是神州之

(註二六)

所以冠四海萬國。」(原文)(幽谷全集頁七八一)

茲將藤田幽谷正名論原文照錄如下：「甚矣，名分之於天下國家，不可不正且嚴也，其猶天地之不可易耶。有天地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苟君臣之名不正，而上下之分不嚴，則尊卑易位，貴賤失所，強凌弱，衆暴寡，亡無日矣。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周之方衰也，強霸更起，列國力爭，王室不絕如線，猶為天下共主，而孔子作春秋以道名分，王而稱天，以示無二尊，……故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言統於一也。……赫赫日本，自皇祖開國，父天母地，聖子神孫，世繼明德，以昭臨四海，四海之內，尊之曰天皇，八洲之廣，兆民之衆，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自古至今，未嘗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也。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嚴，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是以皇統之悠遠，國祚之長久，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殊庭絕域，未有若我邦也，豈不偉哉！雖然，天下之生久矣，世有治亂，時有盛衰，中葉以來，藤氏專權，其輔幼主，號曰攝政，然特攝其政而已，非攝其位也，及還政天子，則號曰關白，萬機之政，關白其人也，是皆上之所命，非敢為僭號，而天子垂拱之勢，亦有由來矣。鎌倉氏之霸，開府於關東，而天下兵馬之權專歸焉。室町氏之霸，據軍政之下，而驕虐之政，以號令海內，生殺賞罰之柄，咸出其手，威權所在，加以爵命之隆，傲然尊大，奴視公卿，攝政、關白，有名而無實，公方之貴，無敢出其右者，則幾乎武人為大君矣……今夫幕府治天下國家者也，上戴天子，下撫諸侯，霸主之業也，其治天下國家者，攝天子之政也，天子垂拱不聽政久矣，則難變也。幕府攝天子之政，亦其勢爾。異邦人有言，天皇不與國事，唯受國王供奉，蓋指其實也。雖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朝日有真天子，則幕府不宜稱主，雖則不稱主，其治天下國家，莫非王道也。伯而不王，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與其王而用霸術，易若霸而行王道，日本自古稱禮義君子之邦，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不可不慎也。夫既攝天子之政，則謂之「攝政」，不亦名正而言順乎？名正言順，然後禮樂興，禮樂興，然後天下治，為政者，豈可以正名為迂也乎哉！」(原文)(見幽谷先生遺稿)

(註二八)

(註二九)

(註三〇)

(註三一)

(註三二)

那珂通世支那正統論考(見那珂世遺書)。

見山鹿素行集，原文為日文，採用余又孫先生譯文(日本史③頁四八一)。

中朝事實附錄：『或疑，外朝及高麗比中華(指日本)之人才，其優劣如何？』山鹿素行答曰：『愚謂地有東西之阻，世有前後之差，而中華(指日本)之神聖與外國之聖人，一其揆者，上知之不移，而同天地之秀氣也。夫往古之神勅，可以比堯舜禹之授受，清廟茅屋，粢食不整，可以比神廟之制，人統之授時，可以比用夏時。姑舍之不論，逮如其中人，外朝之人才更不可抗中華也。凡春秋傳所載，亂臣賊子，及名家冒族之冒惡沈淫，中華未曾有之屬不之，況傳之前後乎。如詩賦章句皆祖外國，而中華(指日本)之文士鳴於此者，不可枚舉，仲滿、圓載、金蘭於盛唐之季、王、皮、陸，唯非鳴於此而已，不愧於彼，栗田、阿倍者，中朝之微臣，而或陪宴於麟德，或累寵於肅宗，唯非不愧文章而已，可並按也。書畫白工之技，劍刀器械之藝，亦多不愧於外國也。高麗者，本我屬國也，云云文武，又不可比於外朝，況於中華(指日本)乎！」(原文)

(註三三)

(註三四)

(註三五)

(註三六)

(註三七)

(註三八)

(註三九)

(註四〇)

(註四一)

(註四二)

(註四三)

(註四四)

(註四五)

以上三則，見澤本孟虎水戶幕末風雲錄頁一二四、一二五。

見高成田忠風以漢學為主的私塾(近世日本的儒學頁一〇四四)。

見鳥居龍藏以黃海為中心的山東與朝鮮之連絡(有史以前的日本頁一八一)。

參閱蒙文通古代民族移徙考(禹貢七卷六七合期)。

後漢書卷一一五東夷傳。

參閱傅斯年先生東北史綱第一卷古代之東北。

檀君傳說始見於高麗僧一然著三國遺事，此書成於高麗忠烈王時(一二七五——一三八〇)，距今尚不到七百年。

見東國通鑑外紀箕子朝鮮。

林象撰東史會綱卷二：「新羅法興二十二年(五三六)，新羅初僭年號。東方自有國，皆用中國年號，至是新羅因中國分裂，自號建元。史氏曰：周之時，吳楚僭稱王，春秋夷狄之所以謹名分也。建號紀年，天子之事，諸侯而僭之，越禮犯分莫甚焉！」

參閱小田吾省朝鮮上世史頁九一——一〇三。

正宗實錄卷四十六丁巳二十一年十二月乙卯條。

世宗實錄卷七十三丙辰十八年七月壬戌條。

中國正統論對於日韓越的影響

(註四六)

肅宗實錄卷三乙卯元平(一六七五)四月壬辰條：「(金)壽弘詣宋時烈誦禮書，頭書康熙四年，凡官文書外，雖下賤無書清國年號者，壽弘獨書之。於祭其祖尚容祝文，欲書康熙，一門驚駭，謂之家賊。尚容旬即於江都，而壽弘獨奉清國正朔，至書祝文，其罪戾反常如此！」

(註四七)

朴趾源熱河日記卷十：「及清人入主中國，陰察學術示王之所往，……陸享朱子於十哲之列，而號於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學也，……嗚呼，彼豈真識朱子之學而得其正耶？抑以天子之尊，陽存參之，此其志，審中國之大勢而先據之，鉗天下之口，而莫敢說我而夷狄也。何以知其然也？朱子尊中國而攘夷狄，則皇帝皆著而斥宋，高宗不識春秋之義，討榮禧王相之罪，朱子集註群書，則黃帝集天下之士，徵海內之書為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率天下而倡之曰：此紫陽之緒言，而考亭之遺志也。其所以勸導朱子者，非他也，騎天下士大夫之項，扼其咽而撫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脅，區區自泥於儀文節目之中，而莫之能覺也。」

(註四八)

大元君於「內寅洋樓」事件(即指一八六六年法艦侵入江華島事件)後，令全國通都大邑遍立石碑，銘曰：「洋夷侵犯，非戰即和，主和賣國，戒我萬年子孫。」

(註四九)

大越史外紀卷二趙紀甲辰七十一條。

(註五〇)

大越史外紀卷三屬東漢紀。

(註五一)

大越史外紀卷三十紀。

(註五二)

黎高越鑑通考總論。

(註五三)

大越史外紀卷五前吳王條，史臣吳士連曰：「前吳之興，非徒有戰勝之功，其直百官，制朝儀，定服色，帝王之規模可見矣。」

(註五四)

黎則撰安南志略卷十一，首以丁氏與黎氏李氏等並入世家，黎又休等撰大越史記本紀全書卷一，首為丁氏立「本紀」。

(註五五)

見大越史記本紀卷一。

(註五六)

大越史記本紀卷二李紀一太祖：「順天十九年(一〇二八)三月戊戌，帝崩。……改元大成。史臣吳士連曰：「至於未踰年而改元，則不容不議。春秋之法，君薨，嗣君定位於初喪，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禮也。太宗乃冒先君之牛，以紀年，何哉？天甲子流年，天之運也；人君法天，因甲子之運行，紀在位之久近，從古已然。帝稍於禮樂書數，曾不是考，而倣攬之，遂使後世變為故事，踵而行之，其失大矣！」

(註五七)

大越史記本紀卷五陳紀一太宗元豐三年(一二五三)條。

(註五八)

見大越史記全書卷九後陳紀簡定與慶元年條。

(註五九)

如吳士連進入越史記全書衣引綱目序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紀立」。大越史記全書凡例曰：「十二便君乘時無王，各據地目雄，莫能相統，然吳昌繼以正統書，吳氏之後也。」又曰：「簡定即建元，在丁亥年十月，而稱一年者，尊正統，繼僭偽，與紹慶元年同。」范公著大越史記續編序曰：「凡所續，其繁年之下，非正統及北朝年號，皆兩行分註，與天凡例所書，一遵前史書式，皆所以尊正統，而繼僭偽，舉大綱而昭鑒戒耳。」

(註六〇)

「同書凡例曰：「恭皇帝為權臣莫登庸篡弒，自丁亥至壬辰凡六年，無有立號，則以次年紀之，其莫登庸則兩行分註於次年之下，以尊正統，竊沮僭也。」又曰：「莊宗日亥亥年起義，即位於行在馬嶺，雖未混一中原，亦以正統書之，明其為帝旨，承大統也。」

(註六一)

見大越史記本紀實錄卷六附莫僭紀。

(註六二)

大越史記本紀全書卷五陳仁宗重興八年三月條：「元代之至元，元呼為老令公。代之至邠州，見行省諸平章，昭國王益發時亦任坐，代之獨不禮焉。益稷曰：汝無乃昭道王書兒耶？代之曰：時事變遷，代之素為昭道王書兒，今為使者，亦如平章初為帝子，今反為虜人也。益稷有慚色。」

(註六三)

大越史記本紀實錄卷一黎太祖順天元年條。

(註六四)

大越史記本紀實錄卷三黎聖宗光順二年十月條。

(註六五)

前書同卷黎聖宗洪德元年十一月條。

(註六六)

前書同卷同年七月條。

(註六七)

見大南實錄進書表。

(註六八)

參閱楊義所著越南民族運動史頁八一——八三。

(註六九)

王生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民國三十四年?月大公报)。

(註七〇)

稻葉君山對正統論思想的批判(朝鮮文化史研究頁三七〇)。

(此稿係接受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之補助而完成，特此致謝。)